

莽汉中的义士

晏建怀

秦末汉初的大地上，诸侯份起，群雄逐鹿，他们或来自秦灭六国前的贵族，或是起于绿林之间的草莽。但不论其来路如何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，要立足于强林之中，争取一席之地，甚至成为王侯将相，内心必有狐鼠的诈、蛇蝎的毒、虎狼的狠，从林法则强者胜。然而，在这群如狼似虎的莽汉中，毕竟还有一些人在内心深处坚守着本真、坚守着善美、坚守着忠义，他们面对强权威逼，挺身而出，甚至不惜以生命去呵护内心的坚守，成为那段阴暗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，让人感慨。栾布就是其中显眼的一位。

栾布出身不显，经历坎坷。他是梁地人，年轻时家里十分贫穷，受雇于齐地一酒商，靠打工养家糊口。彭越未反时，与栾布结识，因皆为一介庶民，又心性相通，遂成为好友。后来，彭越在巨野拉起了一支队伍，加入了反秦行列，成了“草头王”。而此时，栾布却遭受厄运，被人贩子掠卖至燕地为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栾布替主人报仇，因侠义智勇而被当时的燕将臧荼所赏识，推荐为都尉。臧荼受封为燕王后，又拜栾布为将。刘邦称帝不久，已经投靠刘邦的臧荼，因担心刘邦的清算，第一个以异姓王的身分反汉，结果叛身死，

栾布也被俘虏。此时已被封为梁王的彭越念及旧情，向刘邦请求赦免栾布，获准后，彭越又任栾布为梁国大夫。所以，对于栾布来说，彭越恩重如山。

汉十年（前197），刘邦因为彭越没有率军随自己亲征陈豨，而将彭越逮捕，随后在洛阳将他处死，并下令说：“谁胆敢前来祭吊或收殓，立刻逮捕。”那些曾经同彭越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友们，都因担心受到牵连，纷纷与他划清界限，噤若寒蝉，无人敢出来吊唁收尸。

当时，栾布正出使齐国，当他回来，得到的却是彭越遭刘邦逮捕和枭首的消息。这犹如晴天霹雳，让栾布悲从心中起，不能自已。他火速赶到洛阳城下，向着彭越高挂于城头的头颅跪拜祭吊，嚎啕大哭。

栾布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引来了负责看守的官吏，他们立刻将栾布抓捕，带到刘邦面前。刘邦骂道：“你难道要与彭越一同造反吗？我下令任何人不得祭吊，你不但违反禁令，而且还哭闹，这难道不是同伙的证明吗？”刘邦随即交代手下将栾布烹杀，立即执行。

当众人将栾布抬向汤锅时，栾布回头朝刘邦喊道：“陛下请让我说一句活，再死也不迟。”刘邦示意他说。众人放下栾布，他说：“当年，陛下困于彭城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，项羽之所以未能打败陛下，正是彭王据守梁地、联汉合力抗楚的结果啊。在那关键时刻，彭王联楚则汉败，联汉则楚败，但他却选择了汉，成就了陛下。而且，垓下之战，倘若彭王置身事外，项羽怎会灭亡？如今天下已定，彭越受封为王，忠心事汉，信心满满。然而，陛下征兵陈豨，仅仅因为彭王有病不能亲自随征，就疑心他谋反，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枭其首、灭其族，实乃千古奇冤，长此以往，恐会大失人心，谁还愿意为汉真心卖命呢？今彭王已死，我生不如死，是烹是杀，悉听尊便！”

刘邦听了栾布一席披肝沥胆的话语，虽然对杀死彭越之举并无一丝悔恨，但他觉得栾布所说却句句在理，人心之失是他最害怕的事情。所以，他对栾布的恨意顿时烟消云散，且对他大为欣赏。于是，马上下令释放栾布，并拜为都尉。

这个意外的结果，是否远出于栾布的意料，不得而知。然而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当时哭祭恩人彭越，栾布是怀着赴死决心的，就这一点来说，他是从林法则下的异类，是秦末莽汉群体中的义士，其凛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，令人感佩，故司马迁由衷赞叹道：“栾布哭彭越，趣汤如归者，彼诚知所处，不自重其死。虽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”

人物志

船山哲学的近世精神——晚明的文化守夜人王夫之（下）

胡森森

参透历史变幻

清初三大思想家中，王夫之的史学造诣很高。王夫之主张“理势合一”的历史观，倡导“史学经世”论，赓续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鉴往知来、以资政道的传统，表现出中国文化对于历史精神根深蒂固的信仰，其本人著作中的史学精神、史学观点亦卓尔不群。王夫之于丧乱之际、鼎革之时读史阅世，反思游谈玄虚之风的误国误民，批判玩物丧志浮光掠影的读史态度，主张以史资世、总结治乱兴亡的教训，从而赋予历史以厚重承载。

王夫之有两部史论著作传世，即《读通鉴论》和《宋论》，这曾是无数读书人的必读书。尤其是《读通鉴论》品评史事，考镜辨章，字里行间寄托对家国之民族的情感，对国史和现实的思考。比如以徐乐提出的“土崩瓦解”之说解释历代王朝覆灭过程，延伸出两者“亡以均，而势以异”的结论，土崩是渐变，尚可挽救，但是“欲支之而不能”，如周汉唐宋；瓦解则是“俄顷分裂而余瓦”，秦隋元犹是也。其实，晚明之节节败退亦何尝不是土崩。再如“唐之亡，亡于人之散”，反思朝廷要员人心涣散，各自为政，不能团结起来为中央效力；“法之应也有限，而人之犯也无方”，以有限之法，尽无方之愿，必然会陷入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的怪圈，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中的“以制对制”“制度陷阱”的恶性循环，为历代王朝改革的经验教训所印证。王夫之穿梭往返于历史现实寻找答案，采用归纳、比较、平议，得出事随势迁、天人合一、理势相成等历史规律，将中国史学中仰观俯察、通古览今的精神发挥到极致，同时也将自己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应用于史学分析，得出关于历史、社会和人性的规律性结论。

离乱反思中形成的政治观

从政治哲学来看，政治学说往

往以现实政治的成功失败为背景，以某一政治人物的人格特征为标的。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政府秘书，在宦海宦僚中写下《君主论》，构筑的理想君主原型，就是其在谈判过程中打过交道的教廷红衣主教波吉亚·切萨雷，后者以强权之势建立教皇军并致力于完成意大利的统一。韩非、李斯的法家思想也绝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建立在战国末期秦国在关中苦心经营、后来居上继而横扫六合的功绩之上。王夫之的政治哲学，则建立在总结明王朝覆灭教训基础上。

“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，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”，王夫之一生坎坷陆离，仕途不顺，仅在流亡朝廷中担当过八品行人的闲职，却一生以此为荣，以名节自持。1643年张献忠克衡州后招纳贤能，拘王聘聘为人质要挟夫之，王夫之刺伤脸和腕，伪装重伤救出父亲。1644年听闻崇祯皇帝自缢，作《悲愤诗》一百韵，之后便在故乡为武装抗清事业奔走，直到1662年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缢杀，王夫之续作《悲愤诗》，晚年隐居石船山著书立传，终老林泉。王夫之一生顶冠着履，“头不顶清朝天，脚不踩清朝地”，清廷官员来拜访赠送吃穿用品，拒不接见，也不接受礼物，并写对联“清风有意难留我，明月无心自照人”恪守晚节。1678年吴三桂称帝衡州，王夫之拒绝写《劝进表》并遁入深山，作《褰裾赋》表明洁身自好的志向，墓志铭自称“有明遗臣行人”。

迂阔背后其实是坚守，南明几个君主人格品行争议不断，却能赢得汉族士大夫拥戴，只因其代表的不是个体，而是华夏文明。王夫之的君主观总体上属于改良主义范畴，但也包含了对传统三纲五常、君臣伦理的突破，比如君位“可禅、可继、可革”，不能“私神器”，主张均天下、反专制，“平天下者，均天下而已”，主张皇帝分权给文武大臣，提出土地民治论，这些思想散见于《宋论》《黄书》《噩梦》等著作中。

所谓夷夏之别，建立在礼义之辩基础上，主张“仁智”不同于“礼义”，华夷皆有仁智，但只有华夏有“礼义”。这里的礼义可以理



解为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，在这个问题上王夫之有时会走向极端，把华夷之别推向人与非人的极端，这与其一生抗清守节的生命历程中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有关。王夫之耳闻目睹故乡衡州被异族铁骑踏破屠戮的惨剧，他不能“学太上之忘情”，也不可能预见后世的康乾盛世，不可能产生脱离时代的立场。他的政治观有情感温度，正如他主张天理在人欲之中、人性于权衡中形成一样，政治也蕴含在生活世界当中。

船山学派的近代回应

随着清王朝深度汉化，夷夏之别的观念已经淡化，昔日的“夷”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代表，对抗海上之“夷”则成为晚清以后中华民族的共同使命。随着湖南人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重刻《船山全书》，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思想发扬光大，在近代历史变局中重现活力，成为国人救亡图存运动的精神导引，对仁人志士启蒙民智、唤醒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。谭嗣同就由其“道不离器”的思想，得出了“器既变、道安得独不变”的结论，为维新变法找到依据。章太炎则评介“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，近代倡义诸公，皆闻风而起者，水源木本，端在于斯”。杨度在《湖南少年歌》中更是喊出了“中国如今是希腊，湖南当作斯巴达；中国将为德意志，湖南当为普鲁士。若道中国果灭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的强音。继欧风美雨沐浴下的广东之后，更具有本土气息的

湖湘学派扛起救亡图存的旗帜，为中国的复兴注入了新鲜活力和灵感，王夫之的余音于空谷之中回响共鸣，令人唏嘘。

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向天乞活埋”。王夫之自拟的这副对联，道出其学术人生无限苍凉悲壮的况味。草木无情、世事难料，静态社会的动态变化，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的变迁，往往以或显或隐、或激烈或静默的方式，深刻影响每一位思想者的抱负、情怀乃至于学说体系。中国儒释道合一的思想史传统，从孔孟到韩愈，再到朱熹理学、陆王心学，经历几千年的建构后，在新的历史变局面面前失语、失序、失措，古老的学术共同体，也面临着革故鼎新的新问题，别开生面难，涅槃重生更难。江山不幸诗人幸，器变带来理变，思想变革的根源是沉重的现实，欢乐与苦难造就了生活及其哲学。王夫之和泪审视剧变的时代，守正创新，在继承的同时逆势而动，创立了湖湘学派朴实自然的学风，将天理天道、人心人性等问题勾连起来，使哲学跳出了书斋一隅而进入大千世界。作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最后的集大成者，王夫之承前启后，开启了以物质的视角、实践的方式理解世界、改变世界的路径，从而贡献了某种近代意义上的元哲学——哲学之哲学。



办法是琢磨出来的，道路是探索出来的，梦想是奋斗出来的。经过百年发展，秦东扩至与晋接壤，穆公要解决秦国“成长的烦恼”。此时，秦已经据有关中大部，但是总体国力仍然不强，明显落后于晋国。穆公奋起直追，制定了东西并举的国策。

稳中求进

穆公在位近四十年，与数代晋公打交道，坚守韬光养晦的方针，以“秦晋之好”为秦国的发展升级争取到宝贵的发展窗口期。

穆公继位之初，东邻晋国的晋献公正如日中天，晋军扩充为“二军”，对内剿灭地方割据势力，对外不断开疆拓土，灭霍、魏、耿，“并国十七，服国三十八”，是当时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。穆公经过几次尝试，确认了秦晋两国的实力对比，很快进行了战略调整。穆公主动迎娶晋



岐下野人前来报答食马之德

东西并进的秦穆公

崔庆

献公的大女儿伯姬，展示出与晋建立并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姿态。晋献公关注重点是中原争霸，也乐于“西线无战事”。

此后，穆公不管晋国内部风云变幻，始终努力维系两国友好的总体框架，不断做晋国新君的“天使投资人”。穆公先后扶持了晋惠公、晋怀公、晋文公，不断延续秦晋之间的联姻，以至于“秦晋之好”成为后世指代婚姻的专有名词。即使晋惠公不守政治承诺，穆公依然以德报怨，当晋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，还运送大量粮

食救济晋国。

当然，秦晋两个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，因崤函之争时而发生剧烈冲突，在晋文公逝世之后，甚至全面转为秦晋争霸。但是，在此之前，穆公已经争取到了近三十年的“战略机遇期”，在相对平静的环境里壮大了秦国。

东西并举

发展既需要准确的方向感，也需要协调的平衡感，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秦力图东进，但也没有忘记经营西方。秦兴于西垂，与西戎诸部共享陇上之地，强大的戎族一直是掣肘秦国东进的关键因素。穆公深知，只有深耕西部的战略基本盘，苦练基本功，才能把国力提升到新的层次，为日后东进打下扎实基础。

由余就像天赐的助手，帮助穆公开启西进的大幕。由余是穆公“五子贤臣”之首，其祖先原是晋人，逃亡到西戎绵诸之地。由余会说晋国语言，也熟知晋国情况；同时侍奉戎王多年，对于西戎风土人情、地形军事也了然于胸，是“东西合璧”的大才。秦穆公三十四年（公元前626

年），戎王派遣由余出使秦国，穆公相见恨晚，一方面礼遇由余，一方面用计离间由余和戎王，最终由余为秦所用。

由余为穆公策划了征服西戎诸国的一揽子方案，恩威并施，各个击破。秦陆续收服绵诸、义渠、大荔等戎族部落，白狄为避其锋芒，甚至东迁进入晋国北部。秦高歌猛进，“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”。这不仅大大稳定了秦国后方，同时提供了优质兵源，为秦国东进奠定扎实的基础。西戎诸部民风彪悍，以战死为吉利，以病终为不详。日后，秦军成为威震天下的虎狼之师，应是吸收了西戎之风。对戎族取得如此大规模的胜利，是一个非凡的成就，周天子专门嘉奖秦穆公，特赐金鼓，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在西方的领袖地位。

四方取士

任何时代，激烈的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，更何况穆公胸怀天下，志在兴国，对人才的渴求更是无以复加。

秦国先祖以养马起家，对于选马驯马很有心得。伯乐是春秋时期的相

马专家，穆公深识其才。伯乐年老后，不能亲力亲为，向穆公推荐了九方皋。九方皋原为“山野鄙人”，但是一位相马“奇才”。他相马剑走偏锋，不分公母、不分毛色，只论马之优劣。穆公包容了九方皋的微瑕之处，使其有施展才能的空间。为伯乐们创造宽松的环境，让伯乐们放手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，穆公堪称是伯乐的“伯乐”。

当然，穆公朝思暮想的不仅仅是千里马，更是天下英才。取人所长，天下无不用之人。连九方皋都可以为穆公所用，又有何人不可用呢？“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来丕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，不产于秦，而穆公用之”。穆公治下，百川汇海，秦俨然成了当时“国际人才”中心。后世秦相李斯，说出了这段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，如此识才用才，秦焉能不盛。孔子甚至认为秦穆公“虽王可也，其霸小矣”，赞赏之情溢于言表。

兴国在民

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千古至理。《资治通鉴》中有“穆公亡马”的小

故事，说穆公爱马，有一匹好马丢失，被“岐下野人”得而食之。官吏调查此事，准备把这群“吃货”绳之以法。秦穆公得知后，说道“君子不以畜害人”，于是索性派人赏赐“岐下野人”好酒，有酒有肉，吃个痛快。如此厚德，无疑彻底感化了“岐下野人”。后来穆公伐晋，不幸陷入晋军重围。三百“岐下野人”为了报答“食马之德”，闻讯赶来“椎锋争死”，在关键时刻如天外奇兵，扭转了战局，协助穆公俘虏了晋惠公，大胜而归。

“穆公亡马”和“岐下野人”只是冰山一角，其背后是穆公推进资源整合、提升国力的不懈努力。穆公之前，“野人”不在册，也不当兵。穆公即位后，坚定地继承秦武公推行县制的政策，进一步削弱宗室贵族势力。同时，县内“置官司”，加强民政管理，掌握户口，扩大兵源，散落在国家各个角落的“野人”不断汇聚到国家的指挥棒下。凡此种种，大大强化了秦国中央政府权威，在国力较弱的情况下，却在制度上取得了先发优势。

穆公在位近四十年，犹如一只目光锐利的“双头鹰”，守望秦土，形成了东西兼顾的基本战略。穆公不仅找对了方向，也找准了方法，一东一西，一张一弛，交替用力，持之以恒，奠定了秦有关中的基本格局。

